

## 转型与会通： 以马克思精神生产视角审视中国传统伦理

张文彬\*

〔摘要〕 马克思唯物史观通过对人类社会演进以及人类意识进化的分析,揭示了人类物质资料生产与精神文化生产之间的辩证关系,即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伦理精神的历史嬗变源自人们的物质生产、经济交往。中国传统道德尚公、重礼、贵和的基本精神,仁爱、崇义、修身的人性修养,充分体现农业文明、血亲关系基础上的伦理样态。从马克思精神生产视角,可以揭示“家国同构”“宗法人伦”“公私之辩”等为主要特点的中国传统伦理精神的生成之谜,以及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变革与中国传统伦理精神转型之间的关系。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背景下,中国传统伦理精神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其独有话语体系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中国智慧。

〔关键词〕 中国伦理精神 历史嬗变 马克思精神生产

〔中图分类号〕B8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23)03-0167-10

DOI:10.13904/j.cnki.1007-1539.2023.03.004

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从物质与精神关系视角揭示了思想、观念、意识的起源、内在本质和发展规律,以及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道德概念不仅体现于社会生活方式中,而且部分构成社会生活方式”<sup>[1](23)</sup>,不同民族共同体认可并遵守的道德体系,都受到生存方式的影响。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关系如何,物质生产到底如何制约意识形式及具体内容,主体意识在怎样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下形成了独特的形式和特质等,此类问题的展开与思考,对于研究不同民族与地域独具特色的伦理精神的生成与历史嬗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伦理精神是社会人伦精神、内在生活秩序,是一个民族长期发展演进形成“自觉的伦理思想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实质

---

\* 作者简介:张文彬,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大庆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江苏南京21002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2BZX088);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青年项目(19KSC102)。

与精神结构”<sup>[2](30)</sup>。中国传统伦理精神反映的是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人际关系的设计、组织和协调方式,体现了在社会生活中社会成员的伦理关系和伦理地位,以及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取向和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性格特征。全球化背景下,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交往日益密切,现代社会所展现的伦理道德新样态、新理念和新结构影响着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向现代转型和发展,这就需要中国传统伦理精神与中国社会发展相契合、相融合。

### 一、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揭示中国传统伦理精神生成之谜

社会生产理论是马克思考察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方法,社会制度的转变归根到底是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变。人们要想实现“创造历史”的使命任务,必须“能够生活”即实现生产物质生活本身,随后才是“新的需要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繁衍”。马克思在《神圣家族》首次使用“精神生产”这一概念,“纯粹”意识并非一开始就为人所有,“‘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质的‘纠缠’”<sup>[3](34)</sup>。人们思想观念、意识形态、道德原则所表现出来的,各民族不同的哲学、法律、政治、道德等精神元素的生产是“物质关系”“物质生产”的直接产物。

#### (一)中国传统伦理精神出场受到物质生产“纠缠”

物质生产方式尤其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决定了人们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期,物质生产在人类社会生产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物质生产匮乏使得原始人无法更好地顾及精神生产,从而使得精神生产遮蔽在物质生产以及繁衍后代的人自身生产之中。原始人在进化过程中的每一步,都要经历过异常艰苦的生存抗争。“猛兽食颡民,鸷鸟攫老弱”(《淮南子·览冥训》),“猘豸、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淮南子·本经训》),在如此恶劣环境中维持生活、获取满足其基本生存的物质资料,成为“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sup>[4](531)</sup>。获取基本生存资料抵御恶劣生存环境,实现民族存续和发展的需要,原始人们不得不结成特殊的社会关系,以群体模式共同劳动、共享成果、相互保护、生存发展。“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王制》),而在这种原始共同劳动中形成了调节人与人之间、个人与集体之间关系的道德情感、道德观念和道德规则。

人类社会形态的变革归根结底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精神生产最初只不过是物质生产的“手段”而已,精神生产必须依附于一定的物质条件才能实现。社会物质资源相对短缺的历史现实,决定了中国传统伦理精神关注道德原则与物质利益的关系问题,甚至将人们道德水平的高低程度归结为现实物质生活。“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为善恶之行,不在人质性,在于岁之饥穰”(《论衡·卷十七·治期篇》)等思想,虽然存在机械性和片面性,但某种程度上揭示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以人的依赖关系主导之下的物质生产方式,决定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密切相关。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关系等涉及道德规范的原则和标准,成为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探讨的重要主题。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内蕴的“见利思义”“先义后利”“天下为公”

“义然后取”“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等道德标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等家国情怀,他们所蕴含的道德理念推动了封建社会的发展、维系了国家的稳定。

中国传统伦理精神源于中华民族的“物质生产活动”“物质交往过程”和“实际生存状态”。古代中国精神文明相较于世界其他文明形态没有明显的停顿和文化断层。尽管历史上也有强悍的游牧民族入侵,但与其他被征服国家不同,中国并没有接受入侵者的语言和文化,反而能够在对入侵国和周边民族潜移默化中,保持自身文化的民族性、系统性和持续性,绵延不断、源远流长。“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击壤歌》)为特点的发达农业经济,不仅为中华民族生存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同时也形成了中华民族重家族伦理、宗法伦理、人伦关系的精神特质。

## (二)生产力发展与自我意识觉醒推动宗法伦理观念形成

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理解无法摆脱宗教观念支配,精神生产在此表现出一种宗教色彩,例如图腾崇拜、神话传说等。“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sup>[5](333)</sup>。赖以生存又无法掌控和驾驭的自然界在人们看来是如此强大、神秘和神奇,从而心理上产生畏惧感和依赖感,并将外在的自然界作为具有生命特质的神灵加以崇拜。奴隶制生产关系正式确立后,宗教崇拜已经由自然宗教转向反映统治阶级意愿的“至上神”,最早被称作“帝”或“上帝”,其命令是至高无上的权威不容置疑和违反。《尚书·舜典》中记载了舜在担任首领时,主持了庄严肃穆的宗教仪式,将上帝看作他们的祖先,“有娥方将,帝立子生商”(《诗经·商颂》)。祭祀“上帝”天神和自然神灵的目的,就是实现其统治的合法性。

中国传统伦理精神的宗教信仰对人们的言论和行为产生重大甚至是决定性影响,上帝、祖先的崇拜决定着人们的旦夕祸福,繁多隆重的庄严祭祀就是要让后人获得幸福,祛崇避祸、求顺致福,“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尚书·召诰》)。佛教传入、道教形成与中国传统伦理精神融合,在宗教道德信仰和宗教道德修养上具有不同的伦理呈现方式。无论是“仁民爱物,忠君尊亲,崇信三宝”,还是“五戒”“十善”和“四摄”“六度”,都源自当时社会经济崩溃、底层人民赤贫、贫富差距拉大,是现实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激化的反映。

马克思认为“颠倒世界意识”的宗教,其本质应当从人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以及社会关系中理解分析。中国传统宗法伦理观念的形成有其自然根源,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密切相关。人类对外在于我们的自然界异己力量无法正确认识和理解,从而产生敬畏感而加以崇拜和信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认识能力的提升,宗教成为反映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存在。当人们无法摆脱苦难就会转向对宗教膜拜获得心灵解脱或者来世的幸福。

## (三)重视人伦关系和等级关系决定了中国传统伦理精神的政治性

人类社会的结构变革进程不同,决定了文明进程不同。古代东方社会是由原始血缘家庭逐

渐演变成血缘氏族、形成部落,发展成为国家。“家国同构”的组织结构体现了中国传统物质生产是以家庭为单位展开的,个人无法脱离家族而独立生存,也就形成了家族、国家利益至上,伦理精神相应地呈现了人伦特性。早在《尚书·尧典》中就有“百姓不亲,五品不逊”的记载,要求“修其五教”(《左传·恒公六年》),实现“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道德诉求。儒家“亲亲、仁民、爱物”的伦理道德核心范畴“仁爱”,就是基于血缘亲族关系基础上,强调对于不同对象施惠仁爱力度是有差异性的。这种差异性充分体现了个体依据血缘亲疏和身份高低,在严苛的封建等级体系中各在其位、各谋其政、不能僭越。在享受血亲地位所带来权利的同时,履行作为家族成员所应当履行的义务。

中国传统社会等级森严,其等级是以政治权力为标志的。殷周时期君主的权威具有至上性,君主代上天统治管理人世间一切,“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北山》)。臣民为国家、君主无条件牺牲、无条件服从就是符合道德原则的,否则就是不德。周统治者总结以往历史实践经验,提出了以德配天、敬德保民、克明峻德、明德慎罚的政治伦理观念。“德”的最初含义就是“授予天命”和统治阶级特权,是天子或者统治阶层用来感化、统治、管理普通百姓的手段。后来,儒家以“仁爱”为核心,反对“以力服人”之“霸道”,主张“以德服人”之“王道”,“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构建是与封建社会关系相适应的,从而实现统治安稳、社会和谐的价值目标。

和西方伦理道德载体是个体之人,强调“公共善”“个体自由”“正义原则”“抽象性”“平等性”道德原则不同,中国传统伦理精神则更加重视人伦关系、集体主义、整体精神、道德修养。中国古代伦理、宗教、政治三位一体的道德特性,根植于当时社会物质文化生活中,使道德成为整个中国文化的基础和根基,遵循共同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诉求。“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社会最高的道德原则和政治规则,仁、忠、孝、节、义是个体必须遵守的价值理念和道德准则,也是统治阶级维护其宗法秩序的重要手段。但精神生产却从未摆脱物质“纠缠”,随着社会生活变化,伦理精神也相应发生着系统转型。

## 二、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变革与中国传统伦理精神转型

唯物史观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揭示现实生产过程,“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sup>[6](547)</sup>。中国社会从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逐步转向大工业生产方式,“社会变化不仅使曾经是社会所接受的一定类型的行为成了问题,而且也使得那种已经界定了先前社会的道德结构的概念出了问题”<sup>[1](28)</sup>。中国自给自足从而孤立于世界秩序的“独立王国”在西方文化挑战与冲击下,呈现出西方价值与中国价值的交锋与对立。

### (一)物质生产的发展和西方文化输入推动中国传统伦理精神转型

“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sup>[7](346)</sup>。物质生产的变革必然引发精神生产的变革,物质生产发展基础上的社会分工与交往的扩大,使得“民族孤立的历史”转向“世界历史”。对社会生产方式变革起到促进的同时,“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sup>[8](34)</sup>。封建制度自春秋战国以来,历经两千多年的发展演进,从繁荣发展走向逐渐没落。明清之际由于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整体变迁,社会已然融入世界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sup>[9](291)</sup>,近代中国伦理精神表现为对自然经济相适应的传统宗法权威主义价值观和道德观的批判,从而追求个性的自由解放,实现价值观转型。

上古时期社会历史条件决定了中国伦理思想“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商君书·更法》)的思维模式,尽管也会有一些变革,也只不过是“托古更化”,即便“六经皆我注脚”,也逃离不开传统观念的影响束缚。近代中国传统伦理精神转向首先是对封建道德腐朽性的揭露批判,龚自珍“以教之耻为先”(《龚自珍全集·明良论二》),强调“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龚自珍全集·壬癸之际胎观第一》),标志着中国近代社会“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康有为、谭嗣同“扫荡桎梏,冲决网罗”,对以“三纲五常”为内涵的封建纲常名教进行激烈批判,认为其动辄给人加上“腹诽”“讪谤”“大逆不道”等罪名,主张用新的资产阶级道德取代封建专制主义旧道德;新文化运动当中,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知识分子都强调对权威主义的批判,以期“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近代中国社会启蒙运动就是为了廓清蒙昧、重建标准、启发理智,在伦理道德领域系统批判反思封建道德糟粕,主张中国社会“根本之救亡”在于改造中国的国民性,将人们从封建道德束缚中解放出来,冲破历史网罗,破坏陈腐学说囹圄,真正实现思想解放。

### (二)中国传统伦理精神从个体道德转向公共道德

马克思将精神生产视为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个体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程度一致。中国传统伦理重视对个体私德涵养,强调个体良知、良能、本心的重要价值,将修身、慎独、养气等个体修养,内化融合到人们的思想感情中成为个体道德品质。西方从古希腊雅典城邦政治开始,就强调公民依据城邦法律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同时承担平等的政治义务。西方思想的涌入使得中国近代思想家们,将伦理的政治价值从个体道德品质转向公共道德。近代中国伦理精神重视培养国民“公德”,也就是“泰西新伦理”,即“国家伦理”,其基本内容就是“利群、爱群、爱国、爱真理”。梁启超表示,中国“家族伦理”强调人身依附关系,无法形成独立自主的人格,因此具有深深的“奴隶劣根性”。“言学问则倚赖古人;言政术则倚赖外国。……故今日欲言独立,当先言个人之独立,乃能言全体之独立;先言道德上之独立,乃能言形势上之独立”(《饮冰室文集》之五)。这种“独立之德”“自由之德”正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所欠缺的精神特质。

孙中山明确表示要建设好国家,需要公民具有“好人格”,其内涵就是“公共心”。这些观念充分体现了受西方思想的影响,近代思想关注行为主体在公共生活领域侧重公共道德。

### (三)马克思主义的出场推动中国传统伦理精神创新性发展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对中国伦理思想发展影响重大。马克思恩格斯在历史和现实维度下,通过对资本主义剥削、异化等现象的批判,进而深入到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生产方式的批判,从而得出伦理学最终归宿即实现精神自由、获得全面自由的发展、形成自由人联合体。伦理学的“近代转向”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密切相关。李大钊于1919年9月、11月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第六号上连续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介绍,并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对道德起源和本质问题进行深度思考,例如道德本质是有利于社会生存的习惯风俗,是社会生活存续的需要,其变化要依据生活变动、社会需要、实践变革。人们精神的改造要与物质改造一致进行。通过对道德问题和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的深刻剖析,李大钊提出了“劳工神圣”新伦理观。陈独秀着重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出,“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sup>[10](225)</sup>,恽代英批判个人主义并对社会主义道德观进行了宣传,毛泽东从革命利益与个人利益、动机论与效果论统一等方面传播、丰富、发展了中国传统伦理内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历史出场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境遇下,承接中国理论自主创新和构建的产物,也印证了“观念并非头脑主观自生,而是人类实践活动即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产物”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落、资本主义萌芽悄然而至,中国经济、政治、思想等领域发展变化决定了中国传统伦理精神也相应地发生变化。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于西方文明涌入进行了阐释,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共产主义道德范式逐步影响着争取国家独立、民族复兴的中国人民。

## 三、中国传统伦理精神的价值审视

马克思并没有否定贬低精神生产在社会发展进程和社会形态更迭中的重要价值,精神生产反而贯穿于物质生产的全过程,通过对物质生产环节要素的影响,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启蒙运动以来,“新”世界系统,形成了以自由、民主、平等、人权为核心的一套价值理念。然而,“由于现代性的到来而引入的一种新的风险景象”<sup>[11](96)</sup>,尤其是在资本逻辑的影响下,原有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失去了效力。这也就使得转型期的中国人伦理道德观念受到前所未有之挑战,物质财富的增多反而使人们充斥着焦虑感、无归属感、无认同感、无价值感、无意义感。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伦理精神也需要与世界文化融合,但“不失故我的认同”,使之与现代文化、现实生活相融相通,成为全体人民精神生活、道德实践的鲜明标识。

### (一)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关系和解

伴随着现代化进程,人权与人道理念更加深入人心,“人性化”的价值观伴随着物质生活的提

高以及民主权利的增进得以实现。伦理精神转型不能仅置于具有认知和行为能力的主体的自我关涉视阈中,还应当回归社会交往共同体当中加以阐释。在现代社会,这种交往共同体范围逐步扩大,从私有空间的范围逐渐扩大到公共空间领域。作为交往关系中的主体来说,更重要的是处于社会、人类的大格局中。

就人与自然关系而言,人从惧怕自然到征服自然,过去的平衡慢慢被打破,生态环境面临崩溃的危险。“‘生态危机’既是一种科学的阐释,在更大程度上又是一个政治的和意识形态性的范畴”<sup>[12](218)</sup>,人的关切点从人际道德关怀逐步延展到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伦理。张载提出“民胞物与”体现了善待人类、善待自然的伦理立场;“仁”的内涵不仅指人伦之爱的道德情感,也包括对生命的同情与关怀,希冀“万物各得其所”。人与万物“并生于天地之间”的伦理前提与道德责任,要求借助“道德武器”,树立“爱自然”“爱环境”之大伦理观,实现人与自然彼此平等、和谐共生的伦理诉求。

人与社会关系而言,矛盾冲突归根到底是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系问题。进入新时代需要立足新特征凝聚新价值共识来调整矛盾,树立新的公共观念、公共意识。人与他人层面,解决各种道德危机需要我们树立“爱社会”“爱他人”之大格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作为拥有个性、自由、权利、自我的主体来说,对于处于困境当中的自我不会无动于衷,那么推己及人,对于需要帮助的他人也应当存有“善心”,扶危济困、善以待人。

就人与自我关系而言,加拿大学者泰勒在《现代性之隐忧》一书中强调,价值层面现代性带来意义的丧失、道德视野的褪色,工具理性猖獗面前的目的的晦暗,自由的丧失等“三个隐忧”<sup>[13](12)</sup>。自我对生命心理体验和生存理性自觉是否有值得期待的价值目标,从而获得实际的生存动力和满足感,这是自我生存的意义和价值所在。西方社会将自我生存信仰完全依托宗教的境遇,已然导致人生无意义、无价值的滋生蔓延,其原因在于个人主义极度扩展所带来的自我封闭、自我孤立,从而失去对社会的关心及生存的意义感。中国传统伦理所设定的生存方式是“人类大爱”之共同体,充分体现自我生活目标、生命意义,内蕴调节自然、人、社会之间和谐共生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要求道德主体对国家、民族与社会的使命责任与政治伦理义务,乃至调节国与国之间的政治规范原则。

## (二)消解资本逻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马克思精神生产的视角,中国社会出现长期稳定没有剧变的真正根源不是文化的落后,而是由于西方工业文明的模式导入使传统的生产模式和生存方式产生了深刻革命。某种文化样态是否具有价值以及价值大小,其根本原因在于其能够满足当下时代的需求。

首先,资本扩张的逻辑带来的价值困境成为当代伦理学的实践课题。资本是现代社会的基础和根据,资本逻辑则成为现代世界的主导逻辑。在马克思看来,资本逻辑在推进生产力发展的

同时,必然引起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资本逐利本性所带来的劳动者异化、资本失序及其霸权统治也导致了社会不公、贫富差距、生态危机、道德危机。资本“若隐若现地在世界各国之间穿梭、周转,对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产生着不容忽视的巨大影响”<sup>[14](34)</sup>,尤其21世纪资本金融化使得整个社会秩序以及人生活的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发生了转变。在“现代性”与“全球化”的“世界历史”宏大叙事框架下,如何消解资本逻辑所带来的困境成为当代伦理学必须思考解决的实践课题。

其次,中国传统伦理精神内蕴的人文价值和道德规范为规导资本逻辑带来的价值困境提供中国智慧和方案。资本支配的时代是极其平面化的时代,人们不再追求生命背后的意义,生活本身成为最终目的。而中国传统伦理讲究仁义、提倡忠勇、尊崇孝道、讲求孝悌、恪守诚信、崇尚正义、追求合和,对内“养性、修身、齐家”反求诸己,对外“治国、平天下”一展抱负。这些价值理念从道德主体层面提出行为要求,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主体精神的价值诉求。在国家层面,它体现了以“至善”为伦理基础的价值标准;在社会层面,它体现了“公正”为尺度的价值追求;在个人层面,它体现了“仁爱”为核心的伦理诉求,这都有利于规导由资本逻辑所带来的私利化倾向。

最后,构建内蕴天下情怀和世界视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应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有效途径。世界历史的形成以及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传播技术迅猛发展,把世界紧密联系起来,形成“地球村”,这必然会带来不同文化传统与风俗的碰撞和交流。由于不同国家、民族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文化基因、价值理念等方面存在差异,一些国家别有用心,贬低甚至诋毁别国文化传统、互不信任、彼此隔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体现了中国传统伦理和而不同的精神,彰显了在与西方文化碰撞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自信。对内强调民族国家大义的整体主义价值取向和家国情怀;对外走和平发展之道,强调协和外邦、睦邻亲仁。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是在与周遭外界和谐共处中把握自身文化特有的处事方式。

### (三)促进道德主体之底线伦理与价值自觉

弗朗西斯·福山在《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中指出:“一个繁荣昌盛的文明社会依靠的是人们的习俗和道德——这些属性只能通过有意识的政治行为间接地形成,并且在对文化的不断关注和尊重的过程中得到滋养。”<sup>[15](5)</sup>道德来源于人们的社会习俗,“各种各样的规范、法规、道德义务和其他习俗将许多经济行为交织在一起”<sup>[15](8)</sup>,其重要性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的。随着现代性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现实问题都是以往不曾遇到的,为什么当代人类明明知道物质财富不是人生幸福的唯一来源,但越来越多的人却陶醉于追逐物质财富的游戏?由此可见,外在道德规约很重要,但内在的心性修养更重要。

现代社会,当自由主义所代表的功利价值取向与传统的“义以为上”的道德原则碰撞时,人们就会算计对比利益与德行所带来后果。为此,个体的实践行为必须遵守底线伦理,这是最基本、最低限度的伦理要求和规范,是道德的最后边界。社会行为一旦突破伦理的界限,原来居于主导地位的道

德秩序就会解体,就会出现道德滑坡乃至道德沦陷。由此,个体的自我修养、自我约束、自我控制也就显得尤为重要。个体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能自觉自愿地坚守伦理底线、坚守正当原则才是重中之重。正因如此,中国传统伦理精神要求“君子必慎其独也”(《礼记·大学》),即使一人独处也需按照道德原则要求自己,不能让违背和欺瞒自我良知的言行滋长漫延。

#### (四)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sup>[16](2)</sup>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深深根植于中国文化传统当中,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世界文明贡献了中国智慧。

中国文化传统中,仁爱、廉耻、礼义、慎独、良知、诚信、自持等思想都体现了道德主体德行的自我完善;见利思义、公而忘私、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万事莫贵于义等体现了中国人对于道德原则与物质利益关系的独特见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凝聚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和有力的道德支撑。中国传统伦理精神内蕴的开放包容、兼收并蓄、政通人和、协和万邦等极具中国特色的伦理原则和文化理念,不仅为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提供新思路,也有利于创造不同世界文明形态平等交流、和谐共生的文明新样态,对世界文明交流与发展具有价值。

在中华民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中国传统伦理精神的功能与价值也与时俱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历史新方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国际格局的变化,都让原本伦理话语体系面临新的冲击挑战。如何满足新的伦理诉求、如何让伦理话语发出新声音实现新价值、如何为全人类的伦理生活贡献中国智慧,中国传统伦理精神唯有实现转型、全通、超越,方能成为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文化资源和精神力量。中国传统伦理精神需要传承和创新,需要与世界文化深度融合、交流互鉴,如此才能推动世界的文明多样化发展。

### 结 语

马克思强调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现实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不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所呈现出来的精神生产具有不同的内容和形态。中国传统伦理精神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历史形态。纵观中国伦理发展脉络,面对不同的历史境遇和历史转折,思想家们总是扎根民族根基和现实土壤,提出不同建构与转换的思想方案与设计方案。这些方案不仅仅是理论的思辨,更是现实转化与实践的尝试。社会转型在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体现了一个社会本身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

社会结构、社会管理、文化样态以及价值观念的深刻变化。中国传统伦理精神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不应当在社会生活舞台上隐退,不应当仅是作为一种历史记忆,而应当在繁荣人类文化过程中发挥其重要的价值功能。

人类社会面临着生态危机、科技颠覆和核战争等重大危机挑战,任何国家都无法置身事外,或作为独立存在去解决全球性问题,不同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地域特色中规约出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作为人类文化应当不断实现“文化交流”“文明互鉴”,从而真正成为我们应对危机时的一种选择。中国传统伦理尚公、重礼、贵和的精神特质对中华文明、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来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需要伦理规约和法律规制,需要明确新的全球治理格局中各个国家的伦理责任,更好地凝聚价值共识和汲取不同文化精华,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伦理支撑。

#### 参考文献

- [1] [美]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 伦理学简史[M]. 龚群,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 [2] 樊浩. 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
- [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 [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6]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7]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8]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9]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0] 孙建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通史: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 [11] [英]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M]. 田禾,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 [12] [美]詹姆斯·奥康纳. 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 唐正东,臧佩洪,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13] [加]查尔斯·泰勒. 现代性之隐忧[M]. 程炼,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 [14] 向玉乔. 英美新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 [15] [美]弗朗西斯·福山. 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M]. 彭志华,译.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 [16]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21-07-02.

责任编辑:耿志刚